

近代亞洲民族解放鬥爭的 三次高漲與中國

丁 則 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近代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 三次高漲与中國

丁 則 良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敘述了亞洲近代最后 80 年中（从 19 世紀 40 年代到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三次高漲的歷史經過，指出各被压迫人民在这三次高漲中所經歷的斗争的共同發展規律，并用具体事例說明每次高漲的特点，对这些方面都作了比較和分析。同时，作者也着重論述了中國人民在这三次高漲中所起的作用和貢獻。

近代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

三次高漲与中國

丁則良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 54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01 号

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7/8 字數 35,000

1956 年 7 月第 1 版

195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0

統一書号：11074·59

定 价：(9) 0.22 元

目 錄

一	問題的提出	1
二	19 世紀 40 年代以前的亞洲与中國	4
三	19 世紀中叶亞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一次高漲与 中國	14
四	19 世紀末叶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二次高漲 与中國	21
五	1905 年以后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三次高漲 与中國	29
六	明治維新和明治維新以后日本、菲律宾的資產 階級革命	47
七	結束語	55

一 問題的提出

在亞洲近代史上，或者更确切地說，在亞洲近代史的最后80年中，即大致从19世紀的40年代到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曾經出現过三次高漲。中國人民在这三次高漲中表現了自己的力量，并且以自己的斗争丰富了这三次高漲的内容。这就是本書所要闡述的主要論点。

这三次高漲，顯示了近代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歷史發展的軌迹。第一次高漲發生于19世紀中叶，其主要表現为亞洲几个國家中的下層人民（主要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城市貧民）的起义。第二次高漲發生于19世紀末叶，其主要表現除了下層人民起义之外，还出現了資產階級政治运动。但这时資產階級政治运动与人民起义基本上沒有結合起來，資產階級对人民起义抱持着不同程度的敌視态度。到了1905年以后，就出現了被列寧称譽为“亞洲的覺醒”的第三次高漲。在这次高漲中，資產階級政治运动与人民起义有了一定程度的結合，形成亞洲几个國家中的資產階級革命。

从19世紀的40年代到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即大致相当于中國近代史的时期——从鴉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約达80年的这一时期，根据胡繩同志最近的論述，中國在这一时期

中曾經出現了革命鬥爭的三次高漲。^① 我認為胡繩同志所論述的這一點是正確的。我現在所要提出的，就是中國近代史上出現了的革命鬥爭的三次高漲，正都是近代亞洲民族解放鬥爭三次高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這就是說，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的發展規律，和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的一般的發展規律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這一共同的發展規律的基礎之上，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鬥爭各有其英勇的表現，而“中國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②，也給亞洲民族解放鬥爭史留下了光輝的烙印。

近代亞洲民族解放鬥爭史上兩個較為特殊的實例：日本的明治維新和菲律賓資產階級革命，也將試加論列。

總之，本書的重點在於試圖闡述這 80 年間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的發展規律，和中國人民的鬥爭對亞洲民族解放鬥爭所做出的貢獻。這些都是亞洲史上的重大問題。本書只是作為學習筆記性質的初步嘗試，書中不成熟和謬誤之處一定很多，希望得到專家和讀者們的指正。^③

① 見胡繩：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載歷史研究 1954 年 第 1 期。

② 毛澤東選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 8 月版，第 626 頁。

③ 本書論述的空間範圍，以亞俄以外的亞洲部分為限。時間方面，大致以 19 世紀 40 年代到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為範圍；不管亞洲近代史分期的上限問題如何解決，就常識判

斷，本書論述到的這一時期，總應在近代史的範圍之內。因此，為簡單醒目計，就採用了現在的書名。實際上，亞洲近代史的上限問題是存在的，在蘇聯東方學者中間，就有不同的意見。例如列斯涅爾（И. М. Рейснер）和魯布索夫（Б. К. Рубцов）等主編的東方各國近代史（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Стран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Востока），以1642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為亞洲近代史的上限（見該書第1卷，第9頁）。而叶菲莫夫（Г. В. Ефимов）和彼德魯謝夫斯基（И. П. Петрушевский）則認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對當時波斯、阿富汗、中國、朝鮮、日本等亞洲國家的影響，幾乎等於零，不能用為亞洲近代史的上限；叶、彼二氏更認為亞洲近代史分期，應以亞洲各國本身歷史發展的特征為標準（見二氏所作評“東方各國近代史”一文，載蘇維埃圖書 1953年第6期）。叶、彼二氏的提法，值得重視，中國史學界也應當針對這一問題，展開討論。

二 19 世紀 40 年代以前的 亞洲與中國

在論述上面所提出的問題以前，首先应当回顧一下從 15 世紀末年新航路發現、歐人東來以後，到 19 世紀 40 年代（為論述方便計，即算到 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前後）這一時期的亞洲與中國。19 世紀 40 年代以前，整個亞洲遭受資本主義國家侵略的總形勢究竟如何？中國的處境如何？這些問題的解決，對於認識 19 世紀 40 年代以後亞洲民族解放鬥爭的歷史發展和中國人民的重大貢獻來說，是十分必要的。這裡只提出一個極為粗糙的歷史背景的輪廓。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和後來的美國對亞洲各國的侵略，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重要階段：①

第一個階段是所謂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大致言之，從歐洲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亞洲一直到 18 世紀後期產業革命發生和 19 世紀初年產業革命在幾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取得重大發展以前，資本主義國家對亞洲的侵略，都帶有資本的原始

① 參閱列斯涅爾、魯布索夫：東方各國近代史，莫斯科大学出版部1952 年版，第 1 卷，第 17—20、30—34 頁；第 2 卷，第 8—15 頁。

積累的性質。這一時期的侵略，是通過海盜式的襲擊、殖民戰爭、欺詐性的貿易、赤裸裸的掠奪和壟斷貿易公司（例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尼德蘭東印度公司）等各種各樣的手段，奪取亞洲人民的財富，而這些財富在運回所謂“宗主國”以後，就變成了它們用來進行擴大再生產、剝削本國和外國勞動人民的資本。

產業革命的發生和發展，使資本主義國家對亞洲國家的侵略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亞洲各國被作為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來源地的階段。這一階段大致由18世紀末、19世紀初伸展到19世紀末年。在這一階段中，資本主義國家對亞洲各國實行廉價商品的進軍和原料掠奪。這種侵略“觸犯到亞細亞生產的經濟基礎”^①，給亞洲各國原有的封建制度帶來了危機。

到了19世紀末年，資本主義發展到它自己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階段。這使列強對亞洲的侵略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商品進軍和原料掠奪之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侵略方式——資本輸出。在這一階段中，帝國主義國家爭奪向亞洲國家投資的機會，控制了亞洲許多國家的經濟命脈，對亞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實行分割和重新分割，使亞洲人民遭受到更為慘酷的剝削和奴役。

以上是亞洲國家遭受侵略的三個階段的大致輪廓，我們

① 馬克思：資本論，郭大力、王亞南譯，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13頁。

進行許多問題的討論，必須切实掌握这个輪廓。

在这几个世紀中遭受侵略的亞洲國家，虽然大致都經歷了上述三个階段，但無可否認各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簡單說來，鴉片战争以前的亞洲國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印度、印度尼西亞是一种类型，奧斯曼帝國和波斯是一种类型，而中國、日本、朝鮮則是另外一种类型。

在第一階段即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中，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就已經在英、荷等資本主义國家的壟断貿易公司的瘋狂掠奪、蚕食鯨吞之下，逐漸淪為英、荷等國直接統治的殖民地。英、荷等國從印度、印度尼西亞這些殖民地搶來的財富，無疑地幫助了自己的產業革命的發生和發展。接着，產業革命又自然給印度、印度尼西亞這些殖民地帶來了廉價商品的進軍和原料的掠奪。印度、印度尼西亞這些殖民地的人民處在英、荷等國直接統治之下，虽然曾經進行過斷續的反抗，却無力阻止英、荷商品在境內泛濫和有用的原料大量被搶走。

奧斯曼帝國和波斯沒有淪為資本主义國家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但這兩個在16、17世紀曾經盛極一時的帝國，到了18世紀就已先后趨于衰弱。在西歐資本主义國家發生產業革命前后數十年間，由于所謂“特權條約制度”的性質上的變化，奧斯曼帝國和波斯開始受到種種束縛。西歐資本主义國家除開後來通過战争對它們進行沖擊之外，在這時就利用了這種“特權條約制度”，“合法地”為自己的商品進軍準備好了一個方便之門。

所謂“特權條約”（英文作 Capitulations，俄文作 Капиту-

ляция,过去有人譯为“投降条約”,是不对的)起源很早。远在1535年奧斯曼帝國鼎盛的时候,苏里曼大帝 (Solyman the Magnificent)就給予法國國王佛蘭西斯一世(Francis I)以第一个“特权条約”,允許法國商人在土耳其領海內航行,在極低的關稅稅率下進行貿易。法國領事对当地法國商民有实行裁判的特权,也有“保护”奧斯曼帝國境內全体天主教信徒的特权。不过,奧斯曼帝國这时給予法國这些特权,并不意味着它的軟弱。“特权条約”也还不是什么不平等条約,而只是由于土耳其的社会情况与西欧不同,不得不定出的一些权宜的措施(这令人想起中國唐宋时期对來到廣州的阿剌伯商人的一些优待办法),而且奧斯曼帝國的苏丹有权随时取消这些措施。此后,英、荷等國也相繼取得了一些特权,經過相当时期,許多特权逐漸变成了奧斯曼帝國的固定的义务,从而也就形成了所謂“特权条約制度”^①。

1740年是奧斯曼帝國与歐洲國家間的“特权条約制度”的歷史發展上的一个重大轉折点。这一年,奧斯曼帝國和法國訂立了新的“特权条約”,此后它和歐洲各國之間的“特权条

① 关于奧斯曼帝國与歐洲國家間的“特权条約制度”的形成与發展,參閱苏联土耳其史家密勒尔 (А. Ф. Миллер)的兩部著作:土耳其現代史綱要(Очерк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Турции),苏联科学院 1948年版,第12頁;土耳其簡史(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Турции),苏联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1948年版,第19—20,30頁。

約”就接踵而來，這些新的“特權條約”變成了束縛奧斯曼帝國的真正的、具有近代意義的不平等條約。這種條約不僅肯定了領事裁判權之類為資本主義列強此後一貫強加於亞洲許多國家身上的東西，而更重要的是，它幾乎完全免除了資本主義國家商人納稅的義務。這使得外國商品可以橫沖直撞地打垮土耳其的手工業，摧殘土耳其的商業，使土耳其更加陷於一蹶不振的境地。

西歐資本主義強盜就是用這種辦法，加上後來的戰爭的沖擊，逐步征服了土耳其的市場。

至於波斯和歐洲國家間的“特權條約制度”，也經歷了類似的發展，只是時間上稍後於奧斯曼帝國。它起於16、17世紀之交波斯沙阿巴斯一世（Аббас I, 1587 — 1629年）在位的時候，他為了招徠歐洲商人，就給予他們以一些“特權”。到了18世紀初，波斯沙胡塞因（Хосейн）又於1708年和1715年先後給予法國商人以“特權條約”，其內容與早期奧斯曼帝國給予法國國王的大致相類。但這同樣並不意味著波斯為歐洲國家所支配。一直到18世紀末年，波斯雖然呈現了衰弱的象征，但還應當說是一個完全自主的國家。1808年，波斯和法國簽訂了一個新的條約，這個條約“巩固和發展了‘特權條約制度’”，是波斯和歐洲國家間訂立的第一个近代性質的不平等條約。其後英、俄等國相繼取得和法國類似的種種特權的地位。這些建築在“特權條約制度”的基礎上、並把它發展起來的不平等條約，同樣為資本主義列強對波斯實行商品進軍和原料掠奪創造了條件，使波斯在19世紀前半，就已經在經濟

上遭受資本主义列强的控制。①

最后一种类型就要算是中國、日本和朝鮮了。中國的封建統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統治，执行着比較嚴格的閉关政策，这同时也反映了小農業与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中國封建社会的經濟結構的作用。在鴉片战争以前，清朝政府先則实行禁海政策，接着曾有一个时期允許沿海各口与欧美商舶通商，但規定出許多限制办法。到了1760年（清乾隆 25年）以后，又改为廣州一口通商，許多限制办法（例如保商制度等）也更加完密。在印度、印度尼西亞淪为殖民地將近百年，在奧斯曼帝國訂立致命的1740年的新的“特权条約”之后整整一百年，中國的这种閉关狀態才被英國的大炮所打破。在英國的大炮的面前，清朝統治者虽然屈服，而中國人民却同被侵略的各國人民一样，仍然不屈不撓地繼續進行斗争。至于日本德川幕府和朝鮮李朝所执行的“鎖國”政策，其性質也大致相同，茲不贅述。②

上述三种类型的比較研究，自然会使中國的某些特点浮

① 关于波斯和欧洲國家間的“特权条約制度”的歷史發展，參閱伊凡諾夫（М. С. Иванов）：伊朗史綱（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Ирана），苏联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1952年版，第70、77、110、132頁。

② 关于日本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參閱茹科夫（Е. Жуков）：日本歷史講話，胡明譯，耕耘出版社 1949年版，第94—104、123—126、129—132頁；关于朝鮮李朝的“鎖國”政策，參閱李清源：朝鮮近代史，丁則良、夏禹文譯，三联書店 1955年版，第31—32、36—43頁。

現出來。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國在資本主义列强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的階段，和積極开拓商品銷售市場、搜尋原料的階段的前半（也就是說，一直到鴉片戰爭的前夕），既沒有像印度、印度尼西亞一樣淪為殖民地，又沒有像奧斯曼帝國和波斯一樣，被迫打開大門。清朝政府能够執行閉關政策如此之久，而英、法、荷、美等國却不能不長期接受清朝政府對於通商的種種限制，英國幾次派遣使節來要求增開口岸和多給一些通商的特殊權利，也都碰壁而歸。換句話說，資本主义國家的貪婪野心和各種手段長期沒有得逞，其中的原因何在，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為了探究這一問題，下列兩點是應當考慮的。

第一、在資本的原始積累的階段和亞洲國家淪為商品銷售市場以及原料來源地的階段的前半，資本主义國家對中國同樣是懷有野心的。作為侵略政策的先遣隊的傳教士之蓄有征服中國的陰謀，並曾干出種種侵略性的勾當，是已被揭發的、証據確鑿的事實。^①此外，葡萄牙人自1553年（明嘉靖32年）即以海盜式的搶劫和用行賄、欺騙等等手段侵占了澳門，從此，澳門就不斷成為各種陰謀和罪惡的淵藪。更重要的是荷蘭人曾經一度侵占中國的領土澎湖（1604年，明萬曆32年）和台灣（1624—1661年，明天啓4年——清順治18年），最後是被我們的民族英雄鄭成功趕走的。中英關係也是

① 參閱陳慶華：早期天主教士底武力征服中國的陰謀，載歷史教學，2卷，2期。

以武裝衝突開其端的。1637年(明崇禎10年)，英人威德爾 (John Weddell) 率艦4艘，未經明廷允許，徑自闖入虎門，與岸上守軍發生炮戰。威德爾的襲擊終未得逞，並且具結保證不再犯類似罪行。① 19世紀初年，英國在拿破侖戰爭期間和英美戰爭期間，都曾在廣州、澳門一帶尋衅動武，有所窺伺。這時清朝的統治已經日漸衰落，但它對外還能保持強硬態度，因而這些侵略者都未能達到目的。② 這一系列的事實都說明了資本主義列強確曾打過中國的主意，只是在遭到反擊之後，才收斂起來。也許有人懷疑，像英、荷這種侵襲，並不是大規模進犯，未必就是很嚴重的威脅。其實，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本來就和海盜式的襲擊分不開。印度、印度尼西亞之淪為殖民地，推原究始也不外是先遭侵略者海盜式的襲擊，給侵略者在自己的國土上站住了腳，然後再逐步遭到蚕食、并吞而成的。中國人民打退侵略者這種海盜式的襲擊，

① 威德爾的侵襲，見夏燮：中西紀事，第1卷，第13頁；具結保證一節，不見於中西紀事，而見於摩爾斯 (H. B. Morse)：東印度公司紀事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本文系間接引自普刺特 (Sir John Pratt)：歐洲向遠東方面的擴張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Into The Far East)，倫敦 1947年版，第46頁。

② 參閱叶菲莫夫：中國近代現代史綱要 (Очерки по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1951年版，第35—36頁。

不允許他們在中國境內立足，才是他們的侵略野心未能實現的真正原因。這期間，只有葡萄牙人通過行賄等方式侵占了澳門，並給中國帶來了不少的禍害。以澳門為中心的種種政治陰謀，雖然一般未能得逞，却構成了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嚴重的破壞。因此，中國人民有權要求收復這一塊領土。總之，中華民族抵抗外國侵略的頑強精神，正是資本主義強盜在這一時期中還不能無所顧忌的一個主要因素。

第二、中國是個廣土眾民、文化悠久的統一國家。這也是外國侵略者不能不考慮到的因素之一。在侵略者看來，廣土眾民的中國，正是理想的廣大市場。從19世紀中葉起，中、日、朝三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國家中，中國的大門首先被打開，就可從這裡得到部分的解釋。但是從我們自己看來，廣土眾民、文化悠久的統一國家，是我們祖先流了許多血汗、經營締造的成果，是我們具有偉大力量的表現。無論是西班牙、葡萄牙侵略者慣于使用的小批海盜式的遠征隊也好，或者像英、法、荷蘭資產階級組成的，侵略亞洲國家的工具——東印度公司之類的壟斷貿易公司也好，在這個偉大力量的面前，顯然不能輕易施其故技。而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除了廣土眾民和文化悠久之外，我們還是個統一的國家。這就更為具體地顯示出我們的偉大力量。以印度和中國相比，印度也是個廣土眾民、文化悠久的國家，但即使是莫兀兒帝國極盛時期，它的疆域也不曾達到印度全境，並且到帝國末期，印度國家更陷入極度分崩離析的狀態。英國侵略者就利用了它的這一弱點，用滲透、分化和各個擊破等辦法，終於使它淪為自己的殖民地。

上述兩個因素，加上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結構的作用，使外國侵略者在這一時期中既不能征服中國，也不能輕易打開中國的大門，來推銷他們的商品。但我們却不能說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沒有吃過外國侵略者的虧。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強盜，在軟硬兼施的種種試探不得逞的同時，竟公開對中國進行可恥的鴉片貿易。流毒中國前後幾達兩百年，到解放後才告肅清的鴉片，使中國人民受到了無比的損害。

總上所述，可以看出鴉片戰爭以前在資本主義國家侵略下的亞洲的大勢，也可以看出中國的地位與亞洲許多國家有所不同。而中國這種地位的形成，應當說是和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傳統以及我們祖先數千年來在自己土地上流血流汗、經營締造分不開的。要認識近代亞洲民族解放鬥爭三次高漲的發展和中國人民對亞洲民族解放鬥爭的貢獻，首先就要認清這一歷史時期的形勢。